

20世纪 西方文学批评

外国文论小库



(美)雷纳·韦勒克 著
刘让言 译

花城出版社

20 世纪 西方文学批评

外国文论小库

世
文
身

版
地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

雷纳·韦勒克 著

刘 让 言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插页 95,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60—0359—5/I·336

定价：2.90元

引 言

十八和十九世纪都曾被称作“批评的时代”，而二十世纪却真正应该给予这个称号。这时，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批评的突然泛滥，而且文学批评达到了一种新的自觉，一种更加重要的社会地位，近几十年来还发展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新的评价标准。甚至在十九世纪晚期除英法以外还局限在地区性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时也在那些从前似乎是处在批评观念以外的国家中得到传播。这些国家是克罗齐以来的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以及后起的但并非无足轻重的美国。我们要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作任何的探索，就必须注意到这种地理的扩展和同时发生的批评方法的革命。在面对着堆积如山的出版材料中，我们需要有一些选择的原则。

显然，即使在今天，大量的文学批评还是用陈旧的方法在写作：我们仍然被旧的风气、

习俗和文学批评史上的返祖现象包围着。今天的书评仍然起着沟通作家和一般读者的中间作用，仍然使用着惯用的印象主义的描述方法和只凭欣赏趣味的武断评价。历史研究法在评价批评中继续起着重大的作用。在文学与生活之间进行简单的对比始终有其地位，因为对当代小说的评价仍用着反映在作品中的社会状况的可能性和精确性作标准。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有一些作家，而且往往是优秀的作家，他们仍使用着十九世纪文学批评所建立的这些方法：印象主义的欣赏、历史的阐释和现实主义的对比。让我们想一想维吉尼亚·沃尔弗(Virginia Woolf, 1882—1941)所写的那些迷人的唤起幻想的随笔，或者范·维克·布鲁克斯(Van Wgck-Brooks, 1886—1963)所写的那些描写旧时代美国的引起乡愁的短文，或者当前美国小说中大量的社会批评；让我们提一提历史学对文学史上几乎各个时代和各个作家使人更好的理解所作出的贡献。但是，即使冒一些不公正的风险，也要试图把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中的一些新的趋向，作一概略的叙述。

首先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是，在文学批

评中有某些超国界的国际性运动，尽管它们是发源于某一个国家；另一个事实是，从广阔的远景来看，大部分的二十世纪文学批评显示出目的和方法上的令人惊异的相似，即使它们没有直接历史的与文化的联系。同时，人们也不难看到那些好像是根深蒂固的和几乎是不可克服的民族特点，在西方思想的异常广阔的范围里，尽管从俄国到南北美洲，从西班牙到斯堪的纳维亚都有相互的交流，可是各个国家在文学批评中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它们自己的传统。

当然，文学批评的这些新倾向，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并不是没有前例，也不是全然新的创造。尽管这样，人们仍然能够辨别出，在这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至少创始了六个主要的批评流派：（1）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2）精神分析文学批评；（3）以卡尔·荣格的文化人类学和理论为基础的神话文学批评；（4）语言学 and 风格学文学批评；（5）新机体论形式主义文学批评；（6）被存在主义及其类似的世界观所激起的新的哲学性文学批评。

责任编辑：温文认

装帧设计：陈汉中

技术设计：岑宇峻

4291/9f

[美] 雷纳·韦勒克 著
刘让言 译

外国文论小库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

[美] 韦勒克著

刘让言译

诗的效用与批评的效用

[美] 艾略特著

杜国清译

小说写作技巧

[英] 戴安娜著

虞思一译

推荐文论新著

长篇小说的奥秘

何镇邦著

新时期小说史稿

杨树茂著

文学风格论

王明居著

花城出版社邮购科地址

广州东山寺右大马路

寺右一横路

邮政编码 510080

目 次

引 言

一、三个具有国际性的文学批评流派	1
(一)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1
(二) 心理分析文学批评	10
(三) 神话文学批评	15
二、西方各国的文学批评	18
(一) 意大利	18
(二) 法国	35
(三) 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	57
(四) 俄国(兼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69
(五) 德国	79
(六) 英国和美国	118
三、晚近的美国文学批评	153
近年来文学批评的发展	179
主要书刊论文译名对照	190
译后记	216

一、三个具有国际性的文学批评流派

(一)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从审美趣味与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来源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批评。它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意见为基础，但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说来说，却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才出现的。德国的弗朗茨·梅林（Franz—Meiring, 1846—1919）和俄国的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Плеханов, 1856—1918）都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初实践者，然而从后来苏联的教条主义观点来看，他们都是非正统的。梅林把马克思与康德、达尔文连在一起，例如，

他相信艺术的某些自发性，并且对席勒逃避其时代肮脏现实表示赞扬（见传记《席勒》，1905）。在《莱辛传奇》（1898）中，梅林攻击莱辛的学院式观念：他强调莱辛的孤寂以及与腓特烈二世时代的对抗，并对当时的社会条件作了分析。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只是含糊的社会学方法，梅林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样，普列汉诺夫凭着达尔文学说去为先天的美感作辩解，而且在他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学说的讨论中（见《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英文版，1953），他既谴责作为艺术家对资产阶级文化曲折反抗的唯美主义，也谴责纯粹的宣传艺术。

作为严密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只是到了俄国革命胜利以后才发展起来；甚至列宁在他早期的论文中也还是未成体系的，那些论文力图把托尔斯泰作为还未认识到无产阶级重要性的俄国农民的代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在二十年代才具体化为一个严密的体系；但是，即使在那时，许多动摇、暧昧和折衷的观点在俄国还是允许存在的。里昂·托洛茨基（Лев Троцкий，1879—1940）

在其《文学与革命》（1924）一书中尖锐地攻击形式主义，但仍然承认艺术是“按照艺术规律的一种现实的转化”，尼古拉伊·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Бухарин，1888—1938）在1925年全苏作家协会上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折衷理论，至少是允许形式主义占据次要的地位。

在二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中，可以区分为几派：有象弗拉基米尔·别列维尔采夫（Владимир Лелеверзев，1882— ）那样的一些批评家，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用发生学的方法对文学现象作社会的解释；有把马克思主义主要看作论战的武器的一些批评家，他们用这个武器按照对党的直接有用程度来评价一切的文学作品；最后，还有象亚历山大·沃龙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оронский，1884—1935）那样一些敏锐的批评家，他们大都把艺术看作“形象的思维”，它是直观的、无意识的，只是间接地反映社会过程。但是，到了1932年，所有的争论都受到压制；一个统一的教条被制订出来，并强加给人们，此后俄国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际上成为党的路线及其曲折

行程的历史。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是一个不精确的包罗一切的理论，一方面它要求作家去真实地正确地再现现实，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要用一种洞察社会内部结构的眼力去描写当代社会；另一方面，它要求作家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它实际上要求作家不仅正确地再现现实，而且要用他的艺术去传播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去传播共产主义、党性和党的路线。

安德烈·日丹诺夫（Андрей Жданов，1896—1948）宣称，苏联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反映”或者忠实地报道现实，它必须是“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人民的工具”，这个说教与经常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一致的。这样，文学就成为公开说教的和理想化的东西，这就是说，文学不要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而要按照生活应该的样子把它显示给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懂得，艺术是人物、形象、情节和感情发挥作用的。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典型的概念上，把它作为现实主义与理想化的中间桥梁。

典型不仅意味着简单的平均数和代表，它也意味着理想的典型，模范人物，或者简直是读者在日常生活里所要模仿和学习的英雄。

格奥尔吉·马林科夫(Георги Маленков, 1902—)在1925年8月5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宣称：“典型是党性在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始终是一个政治问题。”典型为了达到为党服务的目的，允许对现实作任意的篡改：一个作家可以在俄国创作一个纯然漫画式的艺术品，几乎和神话故事一样，来赞扬苏维埃人，或者对俄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残余进行讽刺。文学批评几乎完全成为小说和戏剧的批评，成为人物和典型的批评。作家（例如爱伦堡和法捷耶夫）不管思想意识多么正统也会受到指责，由于他们没有正确地描写现实——没有对党的作用给予足够的估价，或者对某些人物没有给予完美的描写。苏联的文学批评，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更加民族主义的和地方性的，决不容许提及外国的影响，而且“比较文学”是长期以来被列入黑名单中的学科。在文学批评中，一般艺术的和思考的水平是极低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观察社会过程与

经济动机的深知卓见也很少被运用。文学批评成为传达党规的传声筒。

马克思主义向世界各地广为传播，特别在二十年代期间，在大多数国家里都可找到它的信徒和追随者。在美国，F·V·卡尔弗顿（F·V·Calverton, 1900—1940）和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 Hicks, 1901—）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希克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了《伟大的传统》（1928），对美国文学的历史作了虽然是乏味的、但却是系统的重新解释；伯纳德·史密斯（Bernard Smith, 1906—）写了一本关于美国文学批评史的书，《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力量》（1939）。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在美国文学批评界是十分短暂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于严格的党的路线作家的范围。例如，在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和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 1897—）的某些发展阶段，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英国，克里斯托弗·柯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 克里斯托弗·圣约翰·斯普里格的假名, 1907—1937）是杰出的马克思

主义批评家，特别是他那本《幻觉与现实》（1937）更负盛名，那也是一本依据人类学和心理分析学而形成的奇异的混合物，是对个人主义文明的衰落以及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的灭亡的精心分析。在法国，很少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然而却能广泛地感到这种理论的影响——比如，在萨特的著作中。近年来，卢辛·戈尔德曼（Lucien Goldmann, 1913—1970）论拉辛和帕斯卡尔的论著《看不见的上帝》（1955）、“新小说”派、先锋派戏剧；以及论马尔洛等，曾引起极大的注意。从思想体系来看，戈尔德曼与格奥尔格·卢卡契（Georg Lukács, 1885—1971）是极其相近的。在意大利，安东尼奥·格拉姆塞（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被尊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父，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最后十一年时光是在法西斯的监牢里度过的。他主要是一个政治理论家，可是他那些文学研究论文（见论文集《文学与民族生活》，1950）却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与来自克罗齐美学的许多主题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与克罗齐主义的奇异的结合是格拉姆